



演讲集

“北京文学节”著名学者演讲集

根据地/刘... ◎与青年... 谈生与死...
 .../梁晓... ◎...采的哲学.../周国平

◎对四个成语的解... 我所理解的“真文学”/曹文轩

北京理工大.../海 岩... 今文学审...
 的短篇小说/刘庆邦 ◎大众文化与文化领导权/孟...
 大的演讲... ◎在“底层”眺望“纯文学”...
 与戏剧/邹静之 ◎终结的“新文学”：被“转...
 我们要喜欢文学/肖复兴 ◎当代文学中的鲁迅...
 与文学的关系/徐小斌 ◎小说的理想读者和作者/李敬泽 ◎写作与妇女命运/徐 坤 ◎世纪初的中国新诗走向/吴忠敬 ◎小说面面观/赵大年 ◎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到世界小说艺术的唯一性/阎连科 ◎关于人的内心世界/周大新 ◎科幻小说的发展/星 河 ◎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刘连枢 ◎哲学思想与文学创作/黎 晶 ◎神话主义：中国儿童文学中的革命... ◎散文... 的凝...

演讲集

◎我们要喜欢文学/肖复兴 ◎当代文学中的鲁迅传统/孙 郁 ◎影视与文学的关系/徐小斌 ◎小说的理想读者和作者/李敬泽 ◎写作与妇女命运/徐 坤 ◎世纪初的中国新诗走向/吴忠敬 ◎小说面面观/赵大年 ◎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到世界小说/邱华栋 ◎小说艺术的唯一性/阎连科 ◎关于人的内心世界/周大新 ◎科幻小说的发展/星 河 ◎长期积累偶然得之/刘连枢 ◎哲学思想与文学创作/黎 晶 ◎神话主义：中国儿童文学中的革命... ◎散文... 的凝...

首届北京文学节著名作家学者

演讲集



同心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首届北京文学节著名作家学者演讲集/北京作家协会编.
北京: 同心出版社, 2005
ISBN 7-80716-027-6

I. 首... II. 北... III. 文学研究-文集 IV. I-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1368 号

首届北京文学节著名作家学者演讲集

出版发行: 同心出版社

出 版 人: 刘霆昭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里西街 21 号

邮 编: 100013

电 话: (010) 84276223、(010) 84279112

E-mail: txcbszbs@bjd.com.cn

印 刷: 北京雅艺彩印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版 次: 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1092 1/16

印 张: 28 印张

字 数: 483 千字

印 数: 8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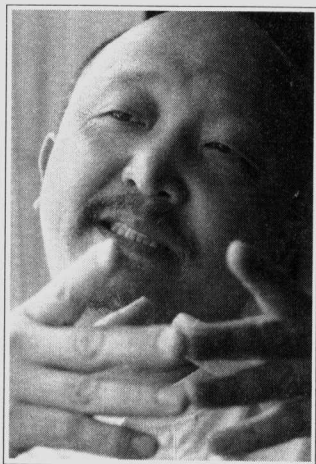
定 价: 39.80 元

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 文学和根据地/刘 恒 1
- 与青年学生谈生与死/毕淑敏 17
- 小说研究/梁晓声 39
- 尼采的哲学贡献/周国平 53
- 对四个成语的解读——我所理解的“真文学”/曹文轩 65
- 在北京理工大学的对话/海 岩 93
- 当今文学审美趋向辨析/雷 达 111
- 生长的短篇小说/刘庆邦 125
- 大众文化与文化领导权/孟繁华 131
- 在北大的演讲/刘震云 147
- 在“底层”眺望“纯文学”/陈晓明 161
- 诗歌与戏剧/邹静之 177
- 终结的“新文学”：被“转换”和被“替代”/张颐武 195
- 我们要喜欢文学/肖复兴 203
- 当代文学中的鲁迅传统/孙 郁 225
- 影视与文学的关系/徐小斌 239
- 小说的理想读者和作者/李敬泽 257
- 写作与妇女命运/徐 坤 269
- 世纪初的中国新诗走向/吴思敬 293
- 小说面面观/赵大年 309
- 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到世界小说/邱华栋 325
- 小说艺术的唯一性/阎连科 355
- 关于人的内心世界/周大新 361
- 科幻小说的发展/星 河 367

长期积累 偶然得之/刘连枢	381
哲学思想与文学创作/黎 晶	391
新神话主义：中国儿童文学的突围策略/杨 鹏	403
写作中的生命感/赵 凝	411
散文：无法回避的革命/祝 勇	425



文学和根据地

刘 恒

刘恒，著名作家。现任北京作家协会主席，驻会一级作家，北京市文联副主席，北京市人大常委，中国作协第六届全委。主要获奖作品：短篇小说《狗日的粮食》获全国第八届优秀短篇小说奖，中篇小说《天知地知》获首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获第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第一届老舍文学奖；由其担任编剧的电影《本命年》获第40届西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菊豆》获第63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提名、西班牙第35届瓦亚多里德国际电影节金穗奖，《秋菊打官司》获意大利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电视剧剧本《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获第18届中国电视金鹰奖第21届全国电视剧飞天奖的优秀编剧奖；报告文学《老卫种树》获首届全国环境文学优秀作品奖。2002年获得首届北京市中青年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奖。

我一进来时，看到会场后面有欢迎我“光临指导”这4个字，真是第一次享受这样的待遇。我首先向我左边的区委宣传部部长唐淑荣和右边的区文联主席史长义同志表示感谢。咱们唐部长和史主席对我这个讲座抱有很高的期待，我也希望能够很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现在，我就试着把我过去讲过的事情和我的经历，重新编织一下，给在座的各位朋友介绍介绍。文学节组织者为了对外发布新闻方便，让每个人都为自己的演讲确定一个题目。我是在家里接听电话时知道这个要求的，就随口说了“文学和根据地”。实际上，我当时对根据地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楚。模模糊糊的有一种感觉，我是想讲一讲我的文学的来源。但真正准备要讲的时候，包括昨天晚上，我才最后确定了我对根据地的解释。我希望在下边的讲述当中，这个解释是合理的，是有效果的。

今天是9月19日，我们北京的文学节正式拉开了序幕。这么集中的、大规模的文学讲演，好像在北京是第一次，在外地也不多见。我不知道这个创意最初是从谁那里提出来的，但是这个创意非常好。它虽然给作家协会的工作者带来了很大麻烦，但它确实为冷落的文学市场提供了一点激情。整个文学节的口号，是“激情·理想·创造”。这三个内容恰恰是文学最需要的。包括我在这里讲演，所要达到的效果，也是要激起大家的创作激情，激起大家的创作欲望。刚才和唐部长聊天的时候，她希望我就《张思德》这部影片多讲两句。这个片子在北京放映的效果非常好，反映也很强烈，多少出乎我的预料之外，因为就我个人而言，写《张思德》是完成一件常规的写作任务。它和我从前的写作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不过题材对我来说非常新鲜，对某些观众来说很陌生。我处理这个题材时，用的仍然是传统的方法，用的是我习惯用的一些技巧。这个作品成功了，我觉得它所达到的水准，在某些方面超越了我从前的写作，但是也只是在某一方面。因为有的时候，一部作品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它所达到的水准是有限的。而且依照常识来看也不可能产生十全十美的作品。所以对这部影片的热影，以及圈里圈外人们给予的那么高的评价，我自己持一种比较现实比较冷静的态度。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半开玩笑地说，一个电影出来之后，各方面的人都可以从电影中吸取自己可以利用的资源，作为圈里的人来说，他最想看到你艺术表达手法的优劣。我个人认为，通过这部作品，我要显示我自己的智力水准，我要显示我创作技巧的水平，我要显示我个人的创作能力对这个题材的适应性，我有一系列这样的目的。一个政治家如果对一部电影感兴趣，他有可能是看中了一部影片中的政治内容和思想内容的某种意义，所以，希望尽可能多的人看到这部电影。但是作为青年人来说，可能只是对这个

陌生人感到很好奇，他是用好奇的眼光，看待革命历史当中一个过去了的人。他看到了一种陌生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可能不接受这种做人的方法，但是他有可能对这种做人处事的方法表示尊敬。所以，一部电影所产生的效果是非常复杂的。你看《张思德》的时候热泪盈眶，是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段里，被影片宣扬的某种信念和情绪所感动，这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作为一个创作者，希望达到这个效果。但是我们更应该怀有一种期待，就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一部电影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对现实的影响是很微小的。一个英雄事迹的巡回报告团，对现实的影响也是很有限的。我认为，真正对现实有所推动或真正改变现实的，是人的具体行动。如果说我想宣扬一个政策、宣扬一个政治口号、宣扬一个政治信念，而我仅仅是在宣扬它，行动却跟不上，而且没有具体的措施和行之有效的方法，那么我的种种美好想法不会对现实有丝毫的积极影响。不管你怎样宣传，回到现实当中，强大的现实还要推着你去走那条走惯了的世俗的道路，理想主义在这里丝毫不起作用。所以，我觉得看《张思德》的时候，如果有所感动，觉得这种为人处事的方法和这种善良的状态非常令人向往，您就不妨从您的行动做起。做一个善良的人，这句话说起来容易，但做起来实际上非常的难。但恰恰是你的行动，才有可能使我们的社会更美好。改变现实最美好的方法，不是小说，不是电影，也不是文学。当然，所有这些艺术表达，对人的精神世界都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但我仍然认为，与强大的现实和人的复杂欲望相比，它们仍然是软弱无力的。以上这些，就算作我的开场白，也是对《张思德》的一个简单的解释。

下面就按照我原有的思路，讲一讲我个人的创作，回到咱们的主题上来，就是“文学与根据地”。类似的讲演机会很多。像北京的一些学校，如北大、清华的学生会和文学社团，一直与我联系，希望搞一些文学讲座。我却非常排斥，认为这种讲座所能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微小的。而且我也不想把自己这些很有限的经验向人家宣扬，它们没有什么普遍意义。但是，有些演讲是推不掉的，还是要讲。比如说，劳动人民文化宫有一个业余作者培训班，那个是基本上每年都要讲的。再有一个就是有一位在大学工作的非常要好的朋友，一定要约我去讲，这是推不掉的。还有就是像今天这样的讲座。这是我们自己组织的活动，是不能推辞的。我要讲的内容，有一部分，在我到中国科技大学给研究生讲课时，曾涉及过，包括上一次我到吉利大学给学生讲课时，也涉及了一些话题。但听的一般都是孩子，我到这来讲，曾提前问过长义，听的大致都是些什么人，我好有针对性地讲，以便调整我演讲的主题。后来听说一部分是

热爱写作的人，一部分是基层的宣传干部。我曾经建议，大星期天的，就别让宣传干部们来了，因为我讲的这些对宣传干部是没什么作用的。后来可能是怕冷场，来的人太少，干脆就多叫几个人吧。实际上，宣传和文学这两个东西在外延上，可能有重叠的地方，但它确实不是一个东西，相同的地方远远没有不同的地方多。但对于人生的认识，大家应该是彼此相近的。所以，我在谈我的文学道路的时候，重点还是放在对我人生的分析上。主要啊还是要解释文学在个人身上所发生的作用。如果大家觉得有用的话，就姑妄听之。如果大家觉得没有意思，只当我随便一讲。如果让我自己解释文学与根据地的含义，对文学不用再解释了，对根据地我可以简单解释一下。根据地通常解释为弱者据守的地方。如果是强者，他应该把自己的这个地方称为大本营，它是属于进攻的态势。但对于一个弱者，作为一个想通过笔杆子，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跟整个人生搏斗的个体来说，在这个根据地里无疑是处于一种退守的状态。你看咱们的红色根据地，在被敌人进攻时苦苦支撑，是非常吃力的。我自己所据守的这个根据地，与这种状况相似。实际上我的根据地，历来都是先处于一种消极的状态，然后我自己与这种消极的状态进行搏斗，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来领略我自己应得的失败和不同的成功。我下边讲五个根据地，分别是乡村、部队、工厂、编辑部、家庭。这是我的五个根据地。这五个部分是空间上的概念。在展开这个空间上的概念的同时，还有一个时间上的概念。我也给它一个命名，叫成长期、成型期、成熟期、成事期、成贼期。所谓贼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老而不死谓之贼。当然，我还没有老到那个程度，但正在往那个方向发展，这是五个时间上的概念。

我现在就先讲第一个根据地——乡村。这个问题，我在别的地方讲的不多。这个根据地最初给我提供的是什么呢？就是苦难和忧伤。这是最主要的两部分，与我年纪相仿的人，对那个时代，会有同样的记忆。当然我说的苦难和哀伤，只是概括了某些方面，并不是生活的全面感受。因为在童年还有欢乐的时光。但最后真正成为我文学的营养，真正被利用的文学资源，是苦难和哀伤。我的父亲是门头沟斋堂人，我母亲是门头沟清水镇洪水峪的人，洪水峪南边是一个山梁，翻过去就是房山史家营、金鸡台这两个村子。我父母在解放初的五十年代跑到北京找工作，变成了城里人。我虽生在北京，却不停地回家乡，因为家乡还有父母的亲人。我的外祖父母还都在洪水峪生活，那时回去，是要雇一匹骡子，走两天的山路，途中要在路上住一个晚上。早年的记忆不多了。自然灾害时期，我正好在家乡吃食堂。每顿饭的水准是每人一碗碴子粥。我常

端着盆给我的外祖父母去打粥。当时食堂的管理人员是我妈的干爹，他总是对我有所照顾。我记得最后那个锅巴，总是留给我。在我刚懂事之后，也就是“四清”的时候，这个人被查出来有经济问题。一下子我们彼此就没有任何关系了，见面也没话了。一直到“文革”时，他一直批斗。我到他们家玩，他就悄悄地给我塞一点吃的东西。我的外祖父虽然没有很明确的说不许我到他们家去，但是他们是不愿我去串门的。这是“文革”前期，“文革”当中，北京的学校都停了课，父母怕我在外边惹事，就让我回了洪水峪，从1966年一直到1969年，我从每天挣3分一直到每天挣5个工分。这段时间，苦难和忧伤的标志就比较明显了。因为村子里成立了各种各样的战斗队，相互批斗。我姥爷是村子里的秀才，他的上辈是很富有的。他的毛笔字也写得很好，许多人在攻击对手时，也常找他来帮助写大字报。那些攻击的人和被攻击的人，我都很熟悉，他们对我都很好，这种攻击和相互攻击，有一种你死我活的感觉，让我产生极大的困惑。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这些人。我举一个非常小的例子，有一年夏天，李子快要熟的时候，我和几个小伙伴准备去偷李子。这些孩子们姓杨，与我外祖父是同一个姓的，但是我和他们的仇方姓刘的那些孩子们也很好。我是无意中泄露这个消息的。结果，摸黑到那儿一看，摘下的李子都是涩的，只好翻山往回走，走到村庄外边时，突然被七八个人给按在那儿了。他们一摸我们的兜，里边没有李子，是空的。这些人是刘家找来的人。偷生产队的李子等于盗窃集体财产，是要受罚的。第二天，杨家就问我，偷李子的事是谁露出去的。那次对我的打击非常大。正是童年的这些小事，对人与人关系这种险恶的感受，几十年之后，当我用文学来反映这个社会的时候，它给我提供了非常深刻的认识。这种人际关系，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正常状态。这种相互伤害可能暂时停止或收敛，但永远不会消失。例如官场，它所体现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能比老百姓之间的关系更集中、更复杂。那种彼此之间的伤害性和攻击性，可能谁都逃脱不了。这种对生活的认识，都源于童年时的感受，是乡村这个根据地提供的宝贵资源。实际上是底层的生活，衬托着我的文学，衬托着我的世界观，而且当我对社会学和哲学的问题有所了解的时候，尤其是用存在主义哲学对人进行分析的时候，我在知识和现实之间找到了联系。另一种苦难的来源，就是在乡村里，不停地有人自杀，这在农村是常见的一种死亡形式。有些得了哮喘病的人，喘得实在受不了了，拿小麻绳绕在自己脖子上，再拿一根筷子，一圈圈地拧，直到最后把自己绞死。还有我的一个邻居，我小时候借住在他们家里，和他们的孙子住在一起。他有一个奶奶，住在小厢房里，小脚根本走不

动路了，满头白发长满了虱子。就这么一个老太太，每天只有孙女儿给她端饭，没有人注意到她的行动。那天，在院子里，她的孙子正给我剃头，我坐在一个倒扣的簋子上，她的孙女儿正端饭进屋，马上大叫着就出来了，说奶奶上吊了。我们进去一看，那间屋的炕上有一个给老太太预备的棺材，房梁很高，老太太几乎不可能把自己挂上房梁，实际上，确确实实就是她把自己挂上去的。老太太颤巍巍地爬到棺材上，用拐棍把绳子挑上房梁，然后把脖子绕到里边。事后大家认定，她肯定是这么干的。她的孙子抱住老人的腿，一下子就哭了。顶着阴阳头的我，当时也傻了，马上杀到旁边的那个院子里，找他们的叔伯兄弟。这时，她的孙子已经用剪子把绳子给绞开了。满院子的人都埋怨他，说这时候只能用手去解绳子，一绞人就不能活了。大家马上通知她在地里干活儿的儿子，立即就给她穿衣服，拆门板。开始叫亲戚、支锅、磨豆腐、送葬，直到最后的摔盆。在没有路的玉米地里抬棺材，那么重的棺材，压过玉米秆往坟地里走，棺材一过，那些玉米一下子又直了起来，这个印象非常的深刻。我在写《菊豆》的时候，送葬的场面和气氛运用的就是这些素材。八十年代，当我把乡村这个根据地的素材加以整理和利用的时候，死亡是其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想，死亡对于一个农民，它的重要意义是什么？人绝望到什么程度，他才不能忍受生活而去自杀？照常理说，选择这个行动应该是非常艰难的。为什么他们这么轻易地就选择了死亡？这种人生的困境到底是怎么回事？难道他死后，会有什么更理想的生存境界吗？这些问题，构成了我写乡村小说的基础，我的《狗日的粮食》和《伏羲伏羲》中，有嚼苦杏仁死的，有自缢的，也有把头扎到水缸里自己呛死的。小说在叙述死亡的时候，实际是在叙述人在困境中的种种选择。当读者从中领会我的某种思想的时候，可以得出各种结论，有可能是对生活的谴责，但是也有可能看出我对人性中韧性的赞扬，也有可能看到宿命论的影响。所有这些感受，都是乡村这个根据地提供的。如果没有这块根据地，我的乡村小说就失去了基础。所以，尽管乡村在我的童年记忆当中，苦涩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最后这些消极的东西还是转换成了积极的东西，它成了我创作的一个来源。这些资源一直积累到我挣5个工分的时候。我的外祖父是个烈属，他是受照顾的，村里给他的那些工分，已经够他吃了，用不着我去挣工分。但我就喜欢干活儿，喜欢跟农民在一块聊天儿，这段经历对我非常珍贵，到目前为止，仍是我储备最多的创作资源。在写作时，到了节骨眼上，我才对这些资源加以利用，让它为我的文学创作提供新的支持。我相信我还能写出更好的乡村小说。

我的第二个根据地——部队。我是1954年生人，15岁当兵。现在15岁的孩子，父母是非常关照的。我1969年当兵的背景是珍珠岛事件，中苏关系吃紧，当时我是外语学院附属小学俄语班的学生，部队需要大批懂俄语的人才，为的是搜集苏联的情报。在部队的生活，成了我写《张思德》的一个基础。在我没有写《张思德》之前，我还不知道这段生活会被这样利用。有人问我，写《张思德》你哪来的生活呀？凭什么去想像六十年前一个军人的生活？我说，过去的军人生活，与现在的军人生活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我当兵的时候，受的是非常正统的教育，灌输的都是你要做一个不怕苦的人，做一个不怕死的人。你要做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人。而且还要做一个完全服从命令的人。部队的这种要求，实际上是要把散漫的人培养成非常有操守的人。我那时确实也是按这个要求去做的，所以，我写《张思德》完全是基于内心的感受，是长期积累的一个结果。对人生的认识，在写《张思德》的时候，得到了一种检验和生发。我当然不能说我当时做的多么完美。当兵六年，可以说是个稀拉兵，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对文学的热爱。我总结部队这个根据地给我带来的消极因素，有两点，是恐惧和自卑。具体说，是对死亡的恐惧。这个恐惧不同于在农村看到的那种死亡，那种死亡从来没有给我带来恐惧。当兵半年多的时候，突然接到一封家信，说我外祖父病故了。而且已经是半年前的事了。信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么几句话，对我来说，却是五雷轰顶啊！我当时想，这么亲近的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他对我非常好。在农村，我喜欢干活儿，不喜欢看书，他说我是个死心眼儿的人，是个没有出息的人。他对我的影响非常之大，他那时居然订着《人民文学》。他熟读唐诗，满院子的白墙上，都用毛笔写上了唐诗，还有他自己写的五言、七言诗。在村头有一个影壁墙，上面有他写的“红旗飘飘”四个大字，站在山头上都能看见。他哮喘非常厉害，我当兵前的一个夏天，天降大雨，雨后的山上流着瀑布一样的白云，他当时长时间地看着，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但是他眼里那种绝望的东西，给我的印象非常深。接到家信后，突然想到，将来父母要死掉，我也要死掉，觉得非常可怕。同伴们讲笑话、打闹都提不起我的兴趣。对人生，我一片茫然。1969年，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号上天，每天晚上，大家都会寻找天空中的那个小亮点。我当时是在部队营房后面的土坡上，抽着烟，看那颗卫星，想到大家将来都会死掉，觉得生活真没意义，这种情绪持续了半年之久。这种情绪最后不治而愈。我说的不治而愈是因为自己毕竟还得活下去，接着就思考怎么活着，能不能活的更有意义，更漂亮一些。那就成名成家吧！成什么家呢？就当作家吧！在这之前，

我对部队生活是充满理想的，但到部队之后，才有了新的情绪。尤其是在“9.13”事件之后，有一种理想的破灭之感。林彪是我们的副统帅，突然就摔死了。一个信仰坍塌了。是谁欺骗了我们？他为什么欺骗我们？这些理想破灭之后，用什么去拯救它？我自己捞到的稻草就是文学。因为当我阅读文学的时候，心灵的伤口得到了抚慰。当我心灰意冷的时候，阅读文学使我感到温暖。我想，如果当一个作家的话，我就是一个创造温暖的人。所以，对作家充满了幻想。我在部队里有一种自卑感，这在学校里已经养成了。比如相对于家境富裕的学生，我只能买那种最便宜的铅笔。再大一点的时候，看见漂亮的女孩子，看见比你聪明比你强健的人，都会产生自己不如别人的自卑感。这种自卑感对人的影响非常之大。我在检讨自己人生的时候，发现部队这个根据地为我提供的最有效的资源就是自卑感。这种自卑感迫使我采取行动，去改变不如人的现状，培养我超越常人的能力。我培养的能力就是对文字的操纵。我通过对文字的这种操纵，成为一个作家。我们应该承认，人是很容易被自卑感压垮的，一旦被自卑感所压垮，就意味着你没有利用自卑感的资源。自卑感虽然是消极的，但它可以燃烧。为了改变现状，你会拼命去奋斗，这种奋斗的燃料是什么，我认为就是自卑感和恐惧。只有这样才能使你的生命更有意义，才能使你成为受人尊敬的人。实际上，你的选择的意义有满足青春欲望的那一面，也有自我实现的一面，还有获取人生价值的一面。人在确定这么一个目的之后，你的学习绝对不用人去督促，学习的欲望是非常强烈的。那个时候，凡是能找到的书，都找来一遍遍地看。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许多鲁迅杂文的小册子，我都买来看了，一遍遍地认真地看。高尔基早期的著作，《在人间》，《我的大学》，能找到的就这么几本，少得可怜。恰恰是这种少，使人充分地集中地消化了这些素材。所以，把这些信息“榨干”之后，都成了自己创作的营养，它为我的创作实力提供了基础。现在的人，看起来很优越，面对的真是信息之海呀，淹没在信息的海洋里，他都不知道该选择什么了。表面上看，是信息量很大，但实际上，他处于一个很不利的境地。相对来说，我们那个时候信息比较少，不需要多少分辨能力，不需要捡垃圾，注意力全放在吸收上。在部队那几年，我的自我奋斗，应该说为我后来的创作提供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那个时候，部队有严格规定，晚9点必须熄灯。如果不利用9点之后的时间，就没有时间去学习，所以，只好打开手电，在被窝里学习。这在别人眼里，被视为不遵守纪律。因为休息不够，第二天工作时就可能打瞌睡，就会萎靡不振，得到的评价就低了，就不是一个好战士了。

但是我的业务非常好，是个业务尖子，不论怎么考试，我都是第一名或第二名。到了该复员的时候，部队非常迫切，希望我作为业务骨干留下来，但因为我爱文学，为了使部队能让我走，就故意采取一些行动，表现出不愿继续干的样子。在我当兵第六年的时候，21岁的我便复员了。部队这个根据地，等于是被我挣脱了。我当时并未想到，这个根据地对我后来的帮助会那么大。当时很多部队的同志，包括我们中队的指导员，都对我说过，你写个人党申请书，再等几天，入党之后，到地方工作方便一些。我当时怕有变化，就说，我不写，回到地方我会好好做人就是了。他们对我说，到了地方之后，你千万不要再做什么作家梦，早点放弃这个梦，省得将来后悔。这个指导员上大学时迷的是费尔巴哈，老想当一个哲学家，攻读过许多哲学著作，后来呢？当然是彻底放弃了。但是，我不想放弃。从部队出来时，依然是雄心勃勃，转入了第三个根据地。

我的第三个根据地——工厂。这是我最艰苦的一段日子。从部队转下来，因为是技术兵种，分到了农机研究所资料室，担任资料员，还有一个工作可以选择，是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但是为了体验生活，为了我热爱的文学，我要到艰苦的地方去，便对负责分配工作的人说，有没有火车司机的工作，有没有炼钢工的工作，有没有挖煤的工作。人家说，你是个复员兵怎么能让你去这些地方呢？结果，我就在分配工作办公室附近转悠、看到了一个被分到汽车制造厂的复员兵，他不愿去，我俩便调换工作了。当时，没有跟父母和其他任何人商量，便把工作调换了。这个决定遭到了家里人的一致反对，都说丧失了这么好的工作，你到工厂去能干什么？但他们不知道，我要实现自己一个伟大的理想，去当一名作家。

就这样，我来到了工厂，不出一个星期，就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在北京汽车制造厂流水线上工作，时间非常紧迫，几分钟就得装一个零件，重复同样的动作感到有一种屈辱，人丧失了主动性，好像是机器的一部分。最关键的是，这个工作剥夺了我学习的时间。累了一天回到家里，根本没有看书的欲望。一个星期后，我就决定，必须跳出工厂。我的手段是什么呢？恰恰还是文学，只有写出好的作品，才能摆脱人生的困境。那个时候，别说当作家的理想，更别提选择到工厂去体验生活这种荒谬的想法，还包括我基本的人生态度，都遭到了周围同事的蔑视，我觉得这是所有在本职之外热爱文学的人普遍遭受的一种惩罚。很多人会说，你有病，净想那些不切合实际的东西。所以，工厂这个根据地给我准备的资源，就是绝望和孤独。我自己可能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理想，这个

信号非常强烈。但除了热爱文学，我没有任何手段。我必须咬着牙坚持下来。为了获得写作的时间，我干了一件蠢事。泡病假的人为了转氨酶高，吃生猪肉，以骗取一个星期假条。还有人在进医务室之前，喝几口生酱油，使测量时心跳加快，心律过速。这些我都干不来。最后，我选择了用大锤砸手，把手敲骨折了，至少可休一个礼拜。当锤子砸下来时，犹豫了一下，砸得不狠，到医务室照片子，一看什么事没有，第二天，还得照常上班。没办法，还得继续工作。

那时，工厂的计划安排挺不合理的，月初没多少事，到月底紧忙，24小时分两班，一班12小时，连轴干。有一天，我们刚干完12小时，正准备去洗澡，总厂的领导来了，说为了完成任务，你们还得接着装几辆车。当时，有一个复员兵，把衣服往地下一扔，哇哇大哭。但是，哭着也得继续工作。我那时从早6点干到晚6点，回到家里，一点力气也没有，简单地洗把脸，吃点饭，从7点开始写作。我妈老催我早点休息，怕误了上班。夏天天亮的早，有时写着写着，一夜就过去了。天一亮，也就不想睡了，一直等到要上班的时间。连着折腾了一天一夜，早晨5点钟，我还得骑车上班，从建国门到大北窑的路上，有一次骑着车就睡着了。车蹭着马路牙子一响，又醒了。就这样一会儿睡一会儿醒的赶路，一路摇摇晃晃地来到工厂。换好衣服，马上在椅子上躺上几分钟，然后开始工作。在这种艰难困苦之下，我的写作不是有计划的，而是下意识的选择，而且目标非常渺茫。只有经过这样的抗争，我才有可能看到希望。现在分析，人到了那种状态，多少有点自虐行为。其实工作那么辛苦，完全可以放弃，累了一天，应该好好休息一下。这种自虐一旦没有结果，自己的人生必须得付出代价。经过自身的努力，得到了收获，只能说是一种恰如其分的回报。

1977年的时候，我住进了工厂的单身宿舍，我们两个人住一个房间，一个准备考大学，我呢？正在写一个长篇小说。我们两个人都熬夜，打饭时只去一个人，把那一份给打回来。什么饭呢？馒头、火烧，就这些。屋里有电炉子，把馒头烤成片吃。有一天，赶上下大雪，我披着衣服写作，毫无指望地写作。理想很远大，但是现实令人失望。后来分析，这种辛酸情绪是一种权宜之计，是一种自我安慰。想到别人都在睡觉，只有我在从事一种高尚的事业，自己觉得很了不起。我感到，工厂这个根据地，给了我消极因素转向积极因素的一个过程。我保持了抗争的状态。张艺谋在工厂时，手劲非常大，因为经常扛麻袋撕麻袋口。生活的困境一直压着他。他靠卖血的钱，买了一台海鸥相机，自己学照相、学构图，培养了自己的艺术表达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他后来考上了北

京电影学院。恰恰是早年的艺术积累，成就了他后来巨大的艺术成就。我跟他交流早年在工厂的生活，有极其相似的地方。我们共同认同一个比喻，当一个弹簧，你把它压紧的时候，它的弹力才显现出来。同样，当生活给你巨大压力的时候，会产生强烈的反弹。所以，不论是青年时代在部队根据地产生的自卑，还是在工厂这个根据地造成的绝望，以及童年时代产生的苦痛和哀伤，这些人生的压力找到了一个合适出口的时候，当你找到释放机会的时候，它所储存的能量会充分地迸发出来。

我的第一篇小说于1977年发表。当时23岁，以后，又陆续地发表作品，几乎没有接到过退稿。虽然小说不多，但经常占据刊物的头条。1979年我25岁的时候，到了编辑部，做编辑，从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成了一个专业文学工作者，终于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愿望。

第四个根据地——编辑部。来到编辑部之后，文学在我的眼里，发生了潜移默化的变化。文学在心目中极高的、神圣的位置在慢慢地降低。我目睹了文学的制造过程，大量的小说，包括名家写的小说，在编辑部审稿者的眼里被反复挑剔，被刷了下来。文学的神奇感，文学的光彩，全部都暗淡下来了。这期间，经历过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1989年的政治风波。文学那种微小的力量，始终在摇摆挣扎。1989年之后，是经济的大规模的改革开放。经济的力量和市场的力量，又把文学推到了非常尴尬的地步。文学的作用在整个生活中是微乎其微的，而且不被重视。一个伟大的有作为的政治家，他的一个信念，可以大幅度地改变社会的状态。一个在经济海洋里游泳的人，一个有资本的人，对世界的影响也可以非常巨大，他可以改变人的精神世界，他可以满足人的欲望并培养人的欲望，乃至创造巨大的财富。而且，包括出版、电影、文学，所有的东西都被纳入到创造利润的狂潮当中去了。在这中间，文学的力量太微小了。在这种尴尬的状态中，我对文学的作用，有点怀疑，有点悲观，我为他献身的愿望有点降低了。我觉得它不足以支持我整个人生，而且不足以体现人生最大的意义。如果说，编辑部这个根据地为我准备了资源的话，它的资源便是厌倦和怀疑。怀疑我文学追求的价值，从而怀疑我人生追求的价值。严格说来，一个人长期地追求一个目标，而且长期用同一个手段追求这个目标，他必定会产生疲倦、厌倦，就像钢铁也会产生疲劳一样。从事文学写作的人产生疲倦之后，主观能动性就丧失了。而且与强大的现实力量相比，你的主观力量要强大到什么程度才能与客观现实平衡呢？说实话，在30岁的时候，我有一段时间放弃了努力。长时间不写东西，居然打了小半年麻将，甚至喜欢上了钓鱼。